

第五章

“官司”不了了之

星期一早上，我发现江面上的八艘舰艇只剩了六艘，原来其中有两艘船按约定在拂晓前就开往东滨江桥附近的船厂去修补被苏军飞机打穿的洞眼去了。我心里断定，那几个闯祸的水兵准在这两条船上。

十一点左右，我正在窗前眺望风景，一辆高级轿车驶向了司令部大门，我忙报告副官处长福岛：“有贵客来了。”

果然，这是日本宪兵长官来找小川顾问，协商处理“理发店事件”的。此人是江北宪兵训练处的日军顾问、最高指挥官，名叫猪寺，与“猪食”同音。不一会儿，午休时间就到了。按惯例，扩音喇叭里要先放一段日本军歌《战死在海上》：

到大海去，葬身在海底，到山峦去，埋葬在草丛……

然后，全体官兵为前线阵亡的“皇军”将士默祷一分钟，再响铃吃饭。我以为中午食堂一定要加几个菜，另设一桌来招待贵宾，哪知毫无动静。原来司令部日本顾问小川不

在，其他人因为猪寺是来“问罪”的，怕不知深浅，马屁没拍正反倒给自己惹麻烦，干脆装傻，愣是没人来关照。那位肥猪似的“猪食”中佐只好后腰上晃着大军刀摇摇摆摆地下了楼，坐上汽车不知到什么地方找饭吃去了。福岛对我说：“左君，你瞧瞧，来者不善啊！你可知道这件事是哪艘舰艇上的人干的吗？”我脑袋马上像拨浪鼓似的晃了起来。别说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还能出卖我的水兵弟兄吗？

下午，小川顾问回来，两个日本长官就把门一关进行了“交锋”。中午的“猪食”大概掺了酒糟，谈话中火气很大。我们隔壁的人不一会儿就听见了两个人对吼和互相砰砰拍桌子的声音。秘书处的镰田上尉见此情景，忙让我调上来一个卫兵持枪守在顾问室门外，闲乱杂人一律回避，任何人不许进入顾问室。

我把随猪寺来的杨翻译官让到了办公室，敬上一支烟，与他聊了起来。这才知道，“曹扒皮”伤势过重，左脚已经残废，今后他的手杖将变成拐杖，再不是身份和威风的象征了。其主子滨口上告到了宪兵总部，猪寺对此事十分恼火，已把那个逃回去的宪兵关了禁闭，今天将把受伤的“曹扒皮”带回江北的宪兵医院；但伤人的凶手一定要找出来严惩，否则决不罢休！

顾问室的争吵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其间，尹大胡子司令派人把我叫去，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经过，但没表态。事情明摆着，有日本人出面，他这个司令也是说不上话的，只好关注事态发展了。

这时，副官桌上的电话响了，勤务兵接了后，把听筒递给我，说：“您太太的电话。”但我立刻听出这不是我老婆。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后，对方才告诉我她是欣茹。原来她听说

了这次事件，怕与我有关，问是否是那次打架的报复事件。我让她放心以后，她便约我晚上七点钟在十二道街的江沿码头会面，说有事要告诉我。我只好答应下来。放下电话才想起，今晚轮到我值宿，这事还有点麻烦。

顾问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一股浓浓的烟雾涌出，猪寺大步走出来，后边是小川，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

接着就是往外抬那个伤员“曹扒皮”。对岸来的运兵艇很乖，靠码头以后没一个人敢下来。在杨翻译官的招呼下，才放下一副担架到后院医务处抬出了半死不活的那家伙。运兵艇没敢穿越江中的舰队，而是绕了个大弧形才驶向了北岸。看来这些人十分谨慎，不愿再惹是非。

我今晚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哄好总值班的日本人、军械处的大岛中尉。这人原是日本海军上士，军械兵，四十岁左右；喝酒喝得眼珠子都发了黄，留着两撇仁丹胡，远远看去像个二毛子。平常一见面，总爱捅捅我的大腿根，顺口就是“一个星期干几回”之类的下流话。我的回答总是“没够”两个字。

晚上人都走光了。这家伙从楼下洗完澡回来，见我站在那儿发愣，便叫我：“快去洗洗，水可热啦！”我忙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中尉殿（对军人的尊称），我今晚有点急事，非去办不可，一个小时就回来，请您行个方便。”

他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惊奇，又开玩笑地说：“是约定去××的吧？滚吧，快点回来！”说完坐在椅子上一边抠脚丫子一边叼上了一支烟。见我站着不动，奇怪地又问了句：“还不快去？”我伸出手来，不客气地说：“把汽艇借我用一用。”他知道我摩托车、汽艇全会开，便爽快地冲放

钥匙的壁柜努了下嘴，嘱咐我：“加点小心！”我乐得一蹦高，取过钥匙向他敬个礼便跑出了大门。在栈桥下找到备用的汽艇，解开缆绳打着火，调过头一溜烟地驰向十二道街的码头。

昏暗中看看手表，是六点四十五分。

欣茹没想到我是从水上来赴约的。她听到身后有人呼唤，又惊又喜地跑下了石头台阶。我探身将她扶下了船舱。远处街市的灯火映出了她一身朴素的装扮和俏丽的身材。依偎在我的怀里，欣茹不停地说着话，问这问那，只是不谈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处境，而这正是我急于想了解的。结婚以后家务负担重，加上业余时间还得去大学听课，所以我很久没见到欣茹了，不知她近况如何。终于，我把话题拉回到了她自己身上。欣茹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和我见面了，在这里她已经没法再生活下去，打算回到山东老家去。我心里明白，妓女生涯已使这个可怜的女人失去了生育能力，将来的生活、出路令人难以想象。而我又实在无力能给她什么切实的帮助。一时两个人默默无言。她也只是伏在我胸前泪水涟涟，一言不发。我摸了摸兜里，只有十几块钱，悄悄塞到她的衣兜里……她觉察到了，但没拒绝。

我看了看表，时间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应该回去了。便拉她走上堤岸，送她到了街口，道一声珍重，便默默地分了手。

回来时，打算买只烧鸡给那个放我出来的大岛，一摸兜才想起钱已经全给了欣茹，只好作罢。将艇开回去，交回钥匙道声谢，了事。

这一晚，我根本没有睡好。欣茹那楚楚可怜的身影一直徘徊在我的眼前，潜入我的梦中。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不

知有多少像她这样的女子沦落风尘，饱受欺凌、蹂躏。等到人老珠黄，或得一身脏病死在某个慈善医院，或沦为乞丐流浪街头。寒冬腊月，冻死在马路上的白条尸体（人一死，就被同类扒走了衣服）中除了大烟鬼外，也有这类女人……还有吉祥理发店的冯掌柜，明天，另有一番磨难在等待着他！对这些人，我的同情是那么苍白无力，而我自己又能比他们强多少呢。虽然表面上趾高气扬，说穿了，还不是一个日本人的奴才、走狗吗……

第二天，我下课回来，到家已是八点多钟了。冯掌柜和他的儿子又来了，桌上摆着水果、糕点盒之类的礼物。俩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盯着我不说话，我知道他们的来意，又安慰了他们一番。告诉冯掌柜准备一下，过几天可能让他去帮着辨认凶手，吓得老掌柜差点儿又给我跪下。我只好拍胸脯保证他无事，只是走走过场，我会见机行事的。

查找肇事凶手的汽艇划开江水，直奔舰队而去。临上登舰的舷梯时，才把那个关禁闭的宪兵手拷打开。理发店的冯掌柜几乎全身瘫软，是在我的全力搀扶下才勉强爬上了船。

首先接受检查的军舰是第二舰队的旗舰，迎接我们的是日本人舰长佐佐木。他胸前挂着望远镜，背着手一脸奸笑地说：“今天士兵都在甲板上，一个不少，看吧，认吧！下边机舱里还有十来个人。”福岛说：“佐佐木舰长，您是否让他们列成一队，这样……”佐佐木立刻拉下脸来，胡子一撇：“扯什么屁话，你去下令吧！”一转身，背着手走了。福岛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和同来的两个日本宪兵队军官、住谷等人商量怎么办。我和司令部警卫队长曲大胖子则没事人一样在甲板上散步。最后，福岛把我叫过去，说：“左君，你叫他

们俩（指挨打的宪兵和冯掌柜）放心大胆地去认凶手，不要有顾虑，明白吗？”

我按原话大声地翻译给那两个人听。于是，只穿着件白汗衫，刚摘下手拷的那个倒霉鬼宪兵和趿拉着布鞋，哆哆嗦嗦、昏头昏脑的冯掌柜，被人像耍猴似的牵着，走向了甲板上各自在忙着自己公务的水兵。

迎着他们的除了板着面孔、怒形于色的脸膛便是五官挪位、丑态百出的鬼脸，弄得人哭笑不得。后来，佐佐木还算够意思，命令轮机长把机舱里的几个水兵也叫了上来，免得我们下到那个又脏又闷的铁棺材里去遭罪。几个轮机兵一露头，甲板上的人哄的一声全笑了起来，有的水兵乐得捧着肚子在甲板上直打滚儿。原来，这些家伙早有准备，竟故意把头上，脸上和光膀子的上身用机油、煤灰抹了个一塌糊涂。其中一个大概是京剧票友，竟在脸上用漆黑如墨的机油勾出个窦尔敦的脸谱来……一个正经人摆的“法律程序”——原告和证人的指正、辨认，被这群丘八爷搅成一场闹剧。气得日本宪兵队长哇哇大叫，又无可奈何。

旗舰上的四五十分钟算白搭了。我们一行人灰溜溜地下舰，又乘汽艇向二号舰驶去。

猛地，二号舰上响起了震耳的汽笛声，不知是欢迎还是警告示威，令人莫明其妙。一上舰，只见三四十个水兵正在光着脚板用水龙头冲洗甲板，水花四溅，脏水横流。根本没人搭理我们。福岛和住谷嘀咕半天，才看到一个日本中尉军官从舰塔上慢慢地走了下来。虽然面熟，但我却叫不出他的名字。只听到他对福岛说：“有收获吗？这回轮到我们这儿了，请随便看吧。”敬个礼，又爬上舰塔去了。福岛只好对那两个日本宪兵说，既然来了，就牵着这两个家伙看看呗。

于是，几个人又例行公事地在舰上转了一圈。那些冲洗甲板的水兵，对我还算客气，只溅在我裤脚上几个水星，那两个“证人”和宪兵被“不小心”淋得像个落汤鸡，狼狈不堪。二号舰上的查认又是不了了之。

去三号舰的路上，身后二号舰的汽笛又吼了几声，像欢送又像嘲弄。三号舰更是不客气，连舷梯都没让我们上。在船舷上露面的日本人中尉叫德川，说话结结巴巴，但驴脾气可非常出名。他又着腰冲福岛大声说：“您有、有事，尽管吩咐、吩咐，其他人想、想登舰，那可没、没门！我们没接、接到什么检、检查的通——通——通知！”这个德川中尉，是个没人性的家伙，会两手柔道，经常打骂士兵，连日本同僚都惧他三分。听说喝了几盅“猫尿”之后，连人事处长池田上校都挨过他打。福岛说：“铃木舰长呢，我要见他。”德川这回没嗑巴，回答很干脆：“不在，去司令部啦！”

福岛和住谷论官阶都比他高，现在却仰着脸和他说话，对方的唾沫星子几乎溅了满脸，一点招也没有。这时，蹲在汽艇舱角的冯掌柜连折腾带吓，已经抽起羊痫风来，牙咬得格格山响。我趁机忙对福岛说：“这老头有多种老病在身，这一犯，老命可就……”福岛头也没回，挥挥手便让白俄驾驶员大伊万返航了。曲大胖子忙撩江水往冯掌柜脸上浇。没用五分钟，汽艇就在司令部码头靠了岸。我忙去大厅里喊来几个卫兵帮曲大胖子把冯掌柜送回了家。回头看见住谷、福岛正站在栈桥上和那两个日本宪兵军官比比画画地说着什么，反正也用不着我翻译，我吹着口哨踱回办公室去了。

从此再没人提起这件事。

而“曹老爷”也就在哈尔滨销声匿迹了。听说他伤好后成了残废，再也不能利利落落地为日本人卖命了，于是军部

一声令下，让他退了伍。而“退伍”即是他的死刑判决书。顷刻间，“曹扒皮”就被日本人扒去了那身宪兵的“虎皮”。失去了“护身符”的他，等于失去了一切。连那些成天围着他转，口口声声喊他“曹老爷”的地痞、无赖、小流氓们都不再瞧上他一眼。本来就是个行尸走肉的大烟鬼，一下子断了钱粮，整天拄着根拐杖，游魂般地来去，遇到的全是白眼和对狗似的呵斥。最后连小孩子也敢朝他扔砖头石块了。不到半年，这个曾经赫赫有名的“曹扒皮”、“活无常”就在烟瘾发作和饥寒交迫中，被真“无常”拘走，结束了他不到四十岁的生命。

一个飘小雪的清晨，有人发现他趴在三道街江沿的水泥台阶上，已经僵硬了……好歹他算闹了全尸，如果赶上日本投降，老百姓非把他拍成肉酱不可。

第六章

检阅团黑河边境之行

1941年（伪满康德八年）秋天，司令部大楼门前的“大满洲帝国江防舰队司令部”的大幅铜匾换成了“大满洲帝国江上军司令部”的字样。日本人参谋长、陆军少将林保治首先到任。其实他只是个日本在乡军人、陆军中佐。小矮个子，白茬短发和乱蓬蓬的花白胡子连成了一片；四方脸，八字眉，意态骄横。挎着四尺来长的陆军大战刀，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地又笨又可笑。半个月内就拖着我和新来的陆军朱副官窜遍了整个舰队，忙得我们俩屁滚尿流。这个林参谋长从不把尹司令放在眼里，不但一次没去拜会过隔壁的这个名义上的“上司”，甚至在走廊里碰个对面也视而不见，连个招呼都不打，气得尹大胡子没少骂街。

上行下效。司令部里海军和陆军军官之间，在日常接触中，在语言上的冲突便经常发生。随着陆军人员的陆续调入，司令部里来来往往的人员由原来夏白、冬蓝清一色海军制服中渐渐搀进了陆军的黄绿色，显得极不协调，不伦不

类。

一年一度的“冬营检阅”开始了。

这是每年在11月份，江上出现流冰之前例行的海军公事。检阅后，各基地的舰只都要做“冬营”准备。把各种舰艇借江上冰床架离起来封存，然后江上军的国防任务便由陆军来担负。我们肩上的担子要轻松到来年的三四月大江开封、江水涌动时。

检阅的路线当然是走水路，沿松花江进入黑龙江，目标是本军三大基地：黑河、富锦、佳木斯。参谋处规划的第一目标就是黑河。黑河基地地处战略要冲，其相隔仅四百多米宽的黑龙江对岸就是苏联小镇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两岸鸡犬之声相闻，不用望远镜就能看清对方的人物和景色。夏天，敌我双方常用俄、日、汉三种语言通过扩音器互相进行政治宣传，有时谩骂，有时拉拢，不一而足。双方在江边密密层层柳树林子里都埋伏着舰艇，神出鬼没；岸上则都设有炮兵阵地和储备各种战备物资的仓库。

我方兵力除本军舰队之外，主要驻扎的是纯牌的日本关东军，大约两个师，另外还有一个团的“满洲国军”。记得念国高时，教我们历史课的日本老师种桥武志先生曾在一年前给我的来信中说，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奉命由在乡军人官复原职——大日本帝国关东军陆军大尉，就驻扎在黑河。如果有机会，我打算去看看他。

今冬的检阅团以司令官尹祚乾、参谋长林保治为首。随行人员是海军中校参谋远藤、陆军少校参谋玉川、海军军械上校安孙子、陆军军需少校白井、陆军上尉副官吾妻。中国人只有海军中尉金副官（日本留学生）和我。共九人。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的检阅团由海军变成了水陆两栖混合队。

其实照我看，检阅不检阅都无关大局，江水照样东流，士气高低依旧。与其说是检阅倒不如说是司令部的长官们出来到各基地散散心，给大伙拜个早年，再趁机捞点油水。我一算，往返得三个多星期，虽然辛苦点，但光出差补助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11月6日，检阅团乘坐的军舰养民号于傍晚六点整准时起锚开航。尹司令说是图个“六六大顺”。由于此行，军舰只是交通工具，无作战任务，所以除驾驶、操作等必需人员外，其他官兵暂调它用。正舰长刘忠宝（湖南人、尹司令的同乡）和副舰长高木中校都是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留舰同行。当养民号拉响汽笛，舰首推开波光粼粼的江面时，天已大黑，两岸已是灯光闪烁了。

翌晨，军舰穿过佳木斯码头一刻未停，仍以四十海里时速前进。甲板上水兵敲钟报时，我看看表正是早晨八点钟。早饭开在刘舰长室内。勤务兵送来一大木盒米饭，菜是日本料理，每人两菜一汤：一段鱼，一碟甜味的炒元葱，大酱汤里漂着几片菠菜叶。由于房间不大，日本人都在副舰长高木的舱内用餐。尹司令、刘舰长、金副官和我，四人围坐在小圆桌周围。尹司令扫了一眼桌上的份饭，好像不太满意，叫金副官把带来的竹制食盒拎出来，叫勤务兵加上两个碟子，拨出两样小菜。我一看，一个是雪里蕻炒红辣椒，另一个是肉丝炒榨菜。我也爱吃辣的，不免多吃了几口。饭后，我倒了一杯白开水，侍候尹司令服下一丸用鸦片制成的黑药丸。司令好像心绪不错，光着脚盘坐在床上和我们聊了起来。谈话中，两个湖南佬都流露出一种明显的伤感。渺茫的前途使他们萌生了解甲归田的愿望。特别是刘舰长，态度极为坚决，他说：“老子只有一个老伴，一个女儿已回老家去嫁人

了……东北没有好小伙子！”说着扫了我和金副官一眼。我垂下头，心中对他的评价深有同感。我们这一代青年已经奴化成妖，只想升官发财，早忘了炎黄祖宗。自认为只要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为养家糊口干这行混碗饭吃，并不为过。否则，别的出路又在哪儿呢？谁来给我指条明路啊！望着舷窗外滔滔东逝的江水，心中阵阵凄楚，一片茫然。

中午时分，虽秋风萧瑟，但天晴日朗，闷在船舱里实在难受，便陪着尹司令和金副官去甲板上散步。两岸已是万木凋零，一片灰黄。但江水澄清如镜，舰首划开水面时，常有松江大鲤鱼跃上甲板，活蹦乱跳。我跑过去想用脚踏住一条，没成想那鱼身溜滑，我一跤跌翻差点滚入江中。舰塔上传来喝骂：“混小子，不要命啦！”抬头望去，原来是高木舰长正在亲自操纵舵轮。日本轮机手大概去吃午饭了。我忙举手敬礼，表示歉意，老头子才龇牙露出笑脸。

当晚九时左右，“养民”号驶抵黑河基地。夜色中，一排炮艇的剪影隐约可见。但基地灯光昏暗，大概是处于国境线上的缘故吧。

迎接我们的基地首席长官、上校处长矢野善一郎和十几个军官，大都是日本人。安排我们下榻的是当地第一流的高级旅馆：“樱屋”。听名便知是日本人开的。

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四个房间里。司令、参谋长各居一室，五个日本人占一个大套间，我和金副官是一个小间。一律日式结构，隔扇拉门糊着白纸，无地无床之分，全铺着塌塌密。晚饭已在船上吃过，所以进屋就是睡觉，没别的安排。闭了灯，钻进下女给铺好的被窝，但并无睡意，我和金副官拥被坐起，点上烟，聊了起来。

这个金副官在日本留学三年，但我发现他的日语水平并

不高。尤其说起话来口吃，在紧要关头更是讲不出话来。就是讲出来也是嗑嗑巴巴，词不达意，常使日本人露出厌烦的表情。他有严重的胃病，吃饭时，常见他皱着眉，手捂在胸口上。由于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谈到了一起。

他对本军这次改编成两栖部队极为关心，并产生严重的悲观情绪。他认定，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海军一定会被陆军的势力压倒，最后上崩瓦解，不复存在。我含糊支应着，没有表态。心说，天塌大家死，你我算哪碟小菜？海军也好，陆军也罢，都是个人无能为力，无法左右的。我个人惟一的愿望就是一定要把大学的课程读完，拿到文凭去换个县长当当，弄个小小的荣华富贵。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不变的宗旨就是：依靠日本人。要效忠两个陛下：一个天皇（日本），一个地皇（溥仪）。

第二天上午，按例将去江边基地和舰队去进行检阅。临出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一看，原来是上校处长矢野善一郎，他手里拿着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左君，我差点忘了，有人找你，这是名片。”我连声道谢、鞠躬，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印着：大日本帝国关东军七二零八部队、陆军大尉种桥武志。右下角是住址和电话号码；翻过来，背面写着：“左奇峰君，有空一定要来我家一趟。”心里非常高兴，决定抽空一定去看看我这位老师。

接送检阅团的是一辆轿车，一台卡车。两个最高长官：尹司令和林参谋长虽然别别扭扭，但仍然得委屈一下“鸡兔同笼”和矢野善一郎同乘那辆轿车，其余人则钻上了带帆布篷的大卡车。第一天在驻地听取汇报，巡视军营、仓库。第二天是登舰检阅，里里外外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全部合格，皆大欢喜。最后是少尉以上全体军官参加的宴会。

宴会于晚上五点钟在“樱屋”举行。楼上打开了三间客房的活动隔板。主宾席上立着名签：尹司令、林参谋长、矢野上校、安孙子上校、刘上校、高木中校、远藤、玉川、儿玉等人位居正中。其余四个桌子左右分开，与主宾席摆成“门”形。总人数约三十七八名，海陆俱全。我位卑职小，自己找了个末座，紧靠门边。宴会开始，尹司令爽快地举起酒杯用日语喊了声：“各位辛苦了！”手一挥，军官们欢呼一声便大吃大喝起来。林保治参谋长这时却站起身来，大声咳嗽一下，准备讲话。我刚想站起来，他却冲我摆了下手：“不用翻译了。”我只好又坐下来。扫一眼室内，发现在座的连我在内“满洲人”才只有六七个，怪不得不用我翻译。林参谋长以宴会上最高首长的口气，大讲本军改为江上军的重要战略意义和光荣使命，口沫横飞，但手中的酒杯也没闲着，下女不断地往里斟酒。在座的军官们一边听一边猛吃海喝，没等林参谋长讲完，下边已经酒意半酣了。

日本军官们大都脱下了上衣，松开了腰带开怀畅饮，用烧酒和大声呼喝来排遣边境军旅生涯的清苦和寂寞。检阅团的成员也不比别人强，身为副官的吾妻上尉第一个现出了丑态。只见他趁一个下女来斟酒时，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右手粗暴地在下女胸前胯下使劲揉搓，嘴里胡言乱语着下流话。下女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他又起身想要跳舞，但腿脚失灵又一屁股跌坐下来，顺手将一盆菜汤扣在了自己的光头上，嘴里大叫：“痛快！痛快！……”头上，胸前“淋漓尽致”。尹司令和刘舰长用家乡话聊着什么，对这“精彩”的表演装没看见。其他日、“满”军官则只是看着发笑，没人做声。最后，林参谋长大概是觉得有伤大和民族的脸面，终于大怒，摔下筷子下命令：“把他拖出去！”近边的白井少校和玉川参

谋每人架起吾妻一只胳膊，嘴里嘟囔着什么，把他架出了门外，后边跟着两个下女。一出门坎，这小子却挣扎着跪了下来，冲屋里喊道：“失礼了！我太兴奋了，对不起……”像条狗似的被拖到楼下，大概让下女侍候着睡觉去了。

我看看表，已是七点多钟，宴会仍在狂欢中进行。我悄悄地溜到矢野处长身后恭敬地向他说明，想去看看老师种桥武志。老头爽快地点头同意了，并让我拿出那张名片给身边的林参谋长看。参谋长把眼珠子从眼镜框外转向我，说：“唔，是你小子的老师吗？关东军大尉呢。”把名片还给我，顺势在我背上拍了一下：“快去吧。”我喜出望外，忙向参谋长坐处鞠了一躬将尹司令包括在内，又向整个宴会席上鞠了一躬告退，便跑出了大厅。

在“樱屋”主人的指点下，我只步行了十多分钟就找到了老师的住宅。这是一排外观相同的七八间平房。借着昏暗的街灯，我在西数第二座房门前发现了钉着上写“种桥武志”的木牌。开门的正是师母，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并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这位并不算老的师母大大地吃了一惊，叫了起来：“啊呀！老爷，是左奇峰君来啦！真是稀客，稀客呀！”

在我脱靴子的时候，种桥老师一手拿着眼镜一手捧着本书迎了出来。“果然是你小子，来得好哇。”我按日本礼节，先跪坐着向老师行礼问好，然后我俩就亲热地拉起话来。种桥老师虽然结婚多年但无儿无女，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天意注定。”对我非常关怀、亲近。我和他虽是不同种族，他的身份又是与我们有着国仇家恨的日本军人，但我知道，他又确实是一个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有着崇高品德的日本高级知识分子。他对我问这问那，话题虽然散乱，漫无边际，

但我能明显地看出，他对日本的处境和当前的世界局势有着非常清醒，但也是非常悲观的认识。并断言自己和老伴会埋骨他乡，再也无法返回日本了。在我告辞时，他好像早有准备，从卧室里捧出一柄日本古刀来。一边褪去紫色的布制刀套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左君，这是一件古董，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是一口三尺不足的日本武士用刀。古代日本武士一般随身带两柄刀，一长一短，长的三尺多，短的二尺左右掖在腰间。此刀古色古香，雕花的铜护手上绿锈斑斑。拔刀出鞘，其刃仍寒光逼人，只是在刀刃前部有一处小豁口，紧挨护手处刻有“冈日正见”四个字隐约可见。种桥老师说这是一柄古代遗留下来的老古董，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传到他手中。上面的“冈日正见”四字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至于是哪朝哪代他也说不清，让我将来有机会考证一下。老师轻轻抚摸着仍十分锋利的刀刃，低声道：“这口刀，不知杀过多少人，但我保证，在我手中它没沾过血。将来，我也希望它永远不再沾染上人类的鲜血，不论他是什么民族、国度……”

踏着朦胧的月光，提着那把古刀，我摸回了“樱屋”。

走廊里正遇见从浴池回来的远藤参谋。他手里拿着肥皂盒，头上扎着毛巾，一眼就盯在了我手中的刀套上：“那是什么玩艺儿？军刀吗？”我只得如实相告。这家伙立刻来了兴趣，直跟进了我的卧室。甩掉趿拉板儿便抓过了我放在塌塌密上的刀套，嘴里一边说着：“对不起，左君，让我先瞻仰一下行吗？”一边将刀套褪下，双手捧住了那柄古刀。

这老头子是海军出身的剑道爱好者。本军每年冬季例行的“寒稽古”（冬季体育运动）都由他组织，让军官们穿上

盔甲，手持竹刀，光着脚板在冰凉的地板上互相比赛劈杀。他平时对我挺和善，办事、讲话总爱眨巴眼睛。欣赏一下古刀我怎能拒绝，何况他已经拿起来了。寒光一闪，刀已出鞘，这老头子凑在灯下，用睡袍的袖子擦拭着刀刃，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嘴里念叨着：“冈日正见，冈日正见……”同时摇晃着已经全白了的脑袋瓜儿，激动得直吞口水。良久，终于将刀入鞘，双手捧还给我，说：“左君，这可是一把非常贵重的古刀哇，你老师能送给你，真是太幸运，太了不起啦！好，请允许我有空再来欣赏。”

这位剑道行家在欣赏古刀的过程中，嘴里曾嘀咕：“卡码枯拉时代的吗？”我听出这“卡码枯拉”是日语“镰仓”，即幕府时代的第一个时期，远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他走后，屋里空荡荡地只剩了我一个人。金副官大概在司令屋里聊天，我不耐寂寞，拿起古刀当话题，打算也去坐一会儿。

尹司令屋内刘舰长、金副官都在。司令的对面桌前跪坐着一个稍有姿色的日本女人，我认出是“樱屋”的老板娘，不知来干什么。尹司令一见我就喊：“你他妈跑哪儿去了！快来，快来，给她划拉几个字吧，真他妈烦人！”我一看桌上放着文房四宝，明白人家是来求字的。老板娘转身冲我连连哈腰，说：“小店来了海军中将阁下，是我们的光荣啊，千载难逢。无论如何请留字、留名才好啊！老爷呀，求你们啦……”又连连跪着施礼请求。司令挥手命我动笔。刘舰长和金副官眨巴着眼睛对我直笑。

上学时我倒练过几天“颜体”，如今早已就饭吃了。但

命令得服从，只好提起笔来在白纸上写下了“花为樱花，人作武士”八个大字，然后将纸调向司令方向，老头子只好歪歪扭扭地写上了“海军中将尹祚乾”几个大小不均的字。老板娘高兴得不得了，频频跪礼，捧着纸墨退出去了。我对她这一套不以为然，日本女人的下贱习俗不仅仅是跪礼伏地，在日常互相闲扯时，连和某某高官、名人睡过觉都引以为荣，大吹大擂叫人恶心。

老板娘刚退出，门还没拉上，林参谋长一脚便跨了进来，连个招呼也不打，哼哼叽叽地满嘴酒气，瞥了一眼老板娘的背影，带着醋意说：“司令官好艳福呀，看这娘们儿还可以吧！”

尹司令是中将军衔，如果是日本人，林保治这个少将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如此放肆。但作为“满洲”军人，面对的是“指导民族”的醉鬼，能奈其何？只气得尹司令脸色铁青，胡茬子都立了起来，呼呼喘大气，一声不吭。林参谋长不依不饶：“司令官，这回出差营养品（指鸦片）带足了吗？阁下年近七十，我看还是早点回乡享福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呀……”屋里的气氛由沉寂忽然变为紧张，大家都预感到今晚要出什么事。尹司令如果是日本人，大嘴巴早已随着“八卡”扇了过去。但此刻，他面对着林参谋长的挑衅和侮辱，只能用气得发抖的手指着林保治的鼻子，用笨笨磕磕的日语大声道：“你喝多了！讨厌，出去！”然后把茶杯墩得山响，大叫下女拿茶来。

这一墩，将林保治的目光引向了桌子，而桌子下边正是我带来的那把褪去了布套的古刀。没等我伸手将刀藏起来，这个鬼子已经惊讶地大叫了起来：“是军刀吗，哪儿来的？”说着手一伸，刀已出鞘。他双手高举古刀，将寒光闪闪的刀

刃凑近鼻尖，似乎在贪婪地嗅着上面是否有血腥味，两眼发红、放光。口中连叫：“古刀！这是一把古刀！好哇……”我吓得心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后悔不该把刀带这儿来。平日自诩呱呱叫的日语，这时连平假名还是片假名全分不清了，磕磕巴巴地连说：“阁下，这是我的老师送给我的纪念物。”

“是吗？他是现役大尉吗，你小子吹牛吧？”他嘴里嘟囔着“冈目正见……”欠起身来，将刀举过头顶左右舞动起来。

我发现尹司令不时地瞟一眼挂在衣架上的那柄海军短剑，心知不妙，忙低声吩咐金副官快去把远藤和玉川两位幕僚找来。金副官会意忙站起来跨出了拉扇门，特意将门扇大开。这时候林保治手中的刀已发出了呼呼风声，又做出劈砍的动作，刀刃距尹司令头顶不到二尺，一出“项庄舞剑”，情景十分可怕。这时，尹司令示意坐在衣架前边的刘舰长快把身后的短剑递给他。可刘老头子已经魂不附体，堆在那里干瞪着眼珠子动不了了。我隔着桌子，更不敢轻举妄动。

外号尹大胡子的司令官，军阀出身，这时岂能静等吃亏，趁林保治眼神转向之时一跃而起，立时将短剑抢到手，拔剑出鞘，将剑尖朝上握在了右手。屋里人立刻刷地闪向墙角，不知如何是好。隔着矮桌，司令官和参谋长各执利刃，一长一短，演起了武戏“三岔口”。两人目视对方眼神，围着桌子顺时针方向慢慢转了起来。这一触即发的白刃格斗把大家全吓傻了，没一个人敢拉、敢动、敢吱一声！

这时，远藤和玉川一个箭步冲进了室内。现场一目了然。俩人一左一右同时抱住了林参谋长的双臂，说道：“阁下，时间不早了！该睡觉了！”林保治用通红的眼珠子扫了

俩人一眼，把刀往桌上一扔，哈哈大笑：“有意思，有意思啊！哈哈哈……”摇摇摆摆地被架出屋门。

远藤回头冲我大骂：“八卡！把刀拿这儿来干什么？混蛋小子！”

我浑身冷汗，站在“塌塌密”上呆若木鸡。想道声歉，嘴里连一个日文字母也没抓着，只是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临行前还有些收尾工作，就是去检查些账目、军械、库存等例行琐事。日、“满”军需官之间的交道仍少不了我这个“臭鸡蛋”。走在去营地的路上我发现，这一行人除我之外全是日本人。“满人”军官，从尹司令到金副官全各行其是或自由活动去了。

在核对账目和检查军用物资、武器的过程中，我穿梭在一堆堆不同项目的人群里，随叫随到，东跑西颠，累得够呛。可气的是，有些“满人”军需官一问三不知，遇技术问题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张口结舌，呆头呆脑，惹得日本人拍桌子大喊大叫，嘴里不断地骂着“混蛋！饭桶！”之类的话，这可用不着我翻译，人人都懂，听惯了。

转眼快到中午了。这时从楼下大大咧咧地走上来一个乞丐形象的人物来。大家不觉一怔。这人满脸大胡子，鼻子下是左右大分的仁丹胡，一双贼溜溜的大眼睛。头顶是黑黄相间的大狗皮帽子（11月份在黑河，这帽子也不算戴早了），上身的破皮夹克敞着怀，空着手，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像在找什么人。

矢野处长一眼看到，忙招呼他：“噢，青山君，你来了……”从人群中走出，拉着这人向林参谋长走去。林保治好像正在看什么报表，摘下眼镜望着对方一动不动，但他已

从直觉上认出来者是日本人。明白这是一个在这边境地区身负特殊使命的人物。

矢野介绍说：“这是我军新任的林参谋长，这位是特务机关的青山中尉。”青山很礼貌地向前一步，脱帽行礼，说了声：“您辛苦了。”

参谋长扫了一眼周围，立刻让矢野把这人请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对这个人物的出现，我心里一点也不奇怪。原来，这个叫青山的家伙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国际间谍。在我的记忆中早有他的影子。夏天，在司令部里，我曾多次看到他出入日本顾问室和参谋处。那时他可不是今天这种打扮，而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凭着特殊的身份，他可以自由出入日、“满”各军各部如人无人之境。现在他出现在黑河，何足为奇。再有一个月，黑龙江就将封冻，双方间谍窜来窜去大肆活动的时机就到了。

这里经常捕捉到苏联间谍，而日方派出的特务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不算新闻。这种明争暗斗的关系，众所周知，但这次青山的出现，来找林参谋长是为何事我却不得而知。

终于，所有的检阅项目完毕，林参谋长对基地全体官兵宣读命令：“基地本年度检阅，成绩良好，特予休假两日。”

下午，在返回旅馆的途中，林参谋长来了兴致，非要我领他去这里的赌场看看不可。问了一个老乡，他用手一指，使我们很快地就找到了地方。那是好大一片房子，足有五开间大小。是用石块、土坯和方木拼凑起来的类似仓库一样的破烂建筑。各种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掀开门帘子，一股汗臭味扑面而来。本来就因窗玻璃肮脏而显得光线不足的屋

里，又被烟草的烟雾充塞，更显得非常憋闷、阴暗，匪窟一般。五六张大木桌子当地摆开，每张桌前都围满了人，在大喊大叫地“押宝”、“掷骰子”，有的人用惊奇的目光扫我们一眼，有的人满不在乎，头也不抬。一个身穿中式棉袄的中年汉子从人群中走出来，我一眼就认出，这是个日本人。他哈着腰向林参谋长行礼问好，连说“辛苦了，谢谢参谋长光临”之类的话。甬问，这就是赌场的场主了。他的后台老板，不言而喻是日本当地的宪兵队或者特务机关。这赌场既是日本人榨取本地财富的工具，又是他们进行收集情报、开展间谍活动的场所和“掩体”。

可怜又可恨的愚昧的“满人”苦力，有伐木工人、沙金矿工，也有水上作业的工人。他们正在把用血汗换来的那点钱扔进这个赌场、烟馆和妓院里。不顾家里老婆孩子啼寒叫饿。门外，就有一个矿工模样的汉子，正一脚踹倒了找他要钱的老婆，转身钻进了这销金的魔窟……血和汗换来的微薄收入，在这里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淌进了日本人或当地恶霸、地头蛇的腰包里。

林保治在每一个赌桌前都绕了一周，始终倒背着手，也没说什么话。吾妻副官紧跟后旋，似乎有些手痒，但参谋长只是看看并不伸手，他便也没敢动。否则，看那神态，早一头扎进人堆里去了。在赌场里，我们参观了二十多分钟便退出，一起回旅馆了。

临行前，我带了两条大马哈鱼去向种桥老师告别。身为炮兵军官的种桥老师去前沿阵地了，师母一人接待了我。谈到将来的日子，师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都已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夜风凛冽，江水冲刷着舰舷哗哗作响。高木舰长一声令下，养民号提前十分钟起锚了。岸上隐约可见矢野处长等人正列成一队在举手敬礼送行。离港的军舰调头向东南方向缓缓移动，渐渐驶入航线，小心翼翼不敢越江心一步。不一会儿，加速到四十海里正常行驶。舱外突然传来尖锐的汽笛声。我们听出，这不是本舰的汽笛声。从舷窗向外望去，左侧约二百米远的江面上出现了两只苏军快艇与养民号同速在前进。这种苏制炮艇，身短舱低，上面扣着锅盖形的装甲，炮口平伸，在飞溅的浪花中几乎看不见艇身。两只快艇紧跟身后，不断地短促鸣笛，无疑是在示威、挑衅；也有监视、侦察之意。直到一小时后，远处黑河小城的灯火都看不见了，他们才返航。